

## 编者的话

奉献在诸位亲爱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孙子兵法》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优秀学术成果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目前《孙子兵法》研究领域最新水平的突出代表。

中国自古为思想精英汇萃之地，也是兵学昌盛之国，素有“兵法之国”美称。产生于2500年以前的不朽名著《孙子兵法》，内容深邃精博，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之一。问世以来，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影响巨大。它久负盛名，长期被尊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其余韵流泽还越出国界，受到外国重视，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捷、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希伯莱等十几种文字，荣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雅誉。《孙子》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在国内外广大《孙子》的研究者、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孙子兵法》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研究内容日益广泛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注释考证、理论阐发、实际应用，千百年来久盛不衰。《孙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上许多军事家、名将、政治家、思想家得益于《孙子》，现在，一个新的“《孙子》研究与应用热”，正在国内外蓬勃兴起。事实上，已形成“孙子学”。

真理有极大的时空跨度。为了弘扬文化，深化研究，以古为鉴，撷精取华，服务人类，军事科学院战略部、总后勤部编审办公室和山东省惠民县携手合作、共同发起，

孙 子 新 探  
——中外学者论孙子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4 插页 283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 000

ISBN 7-5065-1223-8/E·654

定价：7.00元

社编号01—0031

于1989年5月22日至25日在孙子故里山东省惠民县联合举办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美国、法国和全国各地、解放军单位的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学者共五十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他们向大会提交了四十余篇反映研究《孙子兵法》最新成果的学术论文。学术讨论会得到山东省、惠民地区和军队有关单位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上将，著名《孙子》研究家郭化若将军，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上将，军事科学院院长郑文翰中将、政委王诚汉上将、原副院长高锐将军和高体乾将军为会议题辞赋诗，以示祝贺。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中国军事历史研究会、军事未来学会等学术团体给会议发来了贺函。

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选题的广泛性。论文撰写者，既有军队专家，又有地方学者；既有国内代表，又有国外代表。他们不拘一格，不固一隅，所撰写的论文，涉及到军事、历史、文献、思想、经济等各个学科领域。具体地说有《孙子》版本源流考证，《孙子》校勘，孙子军事战略思想，孙子军事哲学思想，运用《孙子》于企业管理，《孙子》对历代兵家的影响，《孙子》在国外的传播，孙子生平业绩，孙子形象探索，孙子故里考证等等。异彩纷呈，当令读者获得诸多方面的内容。

二、学术研究的深刻性。这些论文不仅选题广泛，更重要的是，它们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如有的论文系统探索《孙子》军事思想；有的论文指出，孙子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主要层次，是关于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其内涵实质上是对当时和平与发展主导倾向

(向戌弭兵运动为其标志)的理论呼应，这对今天认识国际形势，把握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几篇关于《孙子》版本源流考证的论文，或从考古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比较研究简本与传本《孙子》在书名、篇题、篇卷、文字、文义诸方面的异同；或考察宋本《十一家注》的成书时间、流变、文字的得失与在校勘方面的价值。有的文章指出孙子“庙算”理论，含有战略的内涵实质，认为现代战略理论不论怎样充实完善，都无法脱离《孙子》所提供的战略理论基础。有的文章对《孙子·势篇》所反映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孙子对“势”的阐述，是其整个兵学体系的灵魂之所在，认为“势”实际上为一种人工造成的力量，潜在时是威慑力，显现时是攻击力。有的论文将孙子对历代兵家的影响作了概括：使中国兵书形成以哲理谈兵的历史传说；使后世兵书沿着“祖述《孙子》”的道路发展，开兵书通俗化之先河。一些论文对《孙子》在国外传播情况作了介绍与总结。这中间既有从整体角度介绍《孙子》在国外流传、影响情况的，也不乏具体综述《孙子》在某一国传播情况的。凡此等等，均写得细致入微，胜义迭呈。应该说，文章的质量是高的，反映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的圆满成功。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在信息时代，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互为借鉴，已成为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这一时代特色，在这些学术论文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有些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借鉴了某些现代学科的研究手段，从而更好地揭示了《孙子兵法》的底蕴秘义；有的论文通过新的思维角度，对孙子兵学体系作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概括总结；也有的论文着眼于新兴学科，为更大范围

内运用《孙子》精义于现代社会生活作出了努力。尽管这些研究手段、方法上的创新性尚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但是这毕竟预示着《孙子兵法》研究的未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以上是我们对与会论文进行总体分析后所获得的基本认识。我们认为，将它们及时编辑成书，贡献给广大读者，以推动《孙子兵法》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是非常有意义的。鉴于这一情况，“《孙子兵法》研究会”委托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中国历代战略研究室设立编辑组，将与会论文筛选编辑成集。编辑组由吴如嵩、黄朴民、刘庆、霍印章、潘嘉珍、许保林、于汝波、王式金、王颜昱、周宏全等同志组成，由吴如嵩同志总负其责。在审编过程中，编辑组根据论文集的规模等实际情况，对入选论文作了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有些会议论文又经作者本人压缩和修改。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掌握建国以来《孙子》研究领域的总体情况，尽可能更多地提供有关信息资料，我们还组织编写了《孙子研究四十年》和《《孙子兵法》研究论著要目》，一并印行，以飨读者。

论文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部长谢国良将军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得到解放军出版社范传新副社长和陈济康编辑的鼎力支持；孙子故里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政府慷慨资助出版补贴，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们一并谨致谢忱。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编辑中如有不当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9年7月

## 目 次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	高 锐 (1)
论《孙子》的战略指导思想	吴如嵩 (9)
战略理论的奠基作——《孙子兵法》	于泽民 (19)
论《孙子》的“善战”思想	谢国良 (33)
简论《孙子》的主动权思想	
.....	李炳众 李洪喜 (49)
《孙子》兵学体系初探	刘 庆 (58)
论《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	
的师承关系	霍印章 (70)
商鞅对兵家的贡献和影响	
.....	(马来西亚) 郑良树 (84)
孙子与美国军事思想	(美) 波拉克 (94)
在《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	
上的书面发言	(美) 克拉维尔 (98)
略论孙子的军事后勤思想	
.....	唐武文 孙深田 (102)
因粮于敌是孙子的重要后勤思想	
.....	李 畔 陈秉山 (112)
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	
.....	(法) 魏立德 (122)

论《孙子》的诡诈战术	杨善群	(131)
孙子用间思想略述	穆志超 苏桂珺	(144)
《孙子兵法》新探	(日) 服部千春	(151)
宋本《十一家注》及其流变	杨丙安	(160)
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	吴九龙	(176)
读《孙子》札记	李 零	(189)
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	黄朴民	(207)
《孙子》势论探析	于汝波	(219)
《孙子·势篇》哲学思想探讨	刘先廷	(229)
孙武形象的探索	王辉强	(240)
析“五战入郢”中孙武子的指挥艺术	胡建新	(249)
孙武故里考疑	吴如嵩 陈秉才	(254)
孙武故里考析	王丙臣	(262)
惠民县建置沿革考略	刘沛然	(267)
《孙子兵法》与系统论	劳允超	(272)
《孙子兵法》与谈判谋略	周 敏	(278)
《孙子兵法》对球类运动竞赛的启示	刘国华	(288)
用《孙子兵法》等古兵法指导	陈炳富 李 非	(294)
市场竞争	张泽田	(303)

略论《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及启示	潘嘉万分	(308)
浅谈国外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杨少俊	(325)
《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及一部古本		
《孙子兵法》的再发现		
高殿芳 陈 彭 王颜昱	(338)	
浅谈《孙子兵法》在日本历代战争、 情报工作中的运用	周宏全 玉泉丁	(352)
建立“孙子学”刍议	许保林	(359)
《孙子》研究四十年	于汝波 刘 庆 吴如嵩	(369)
《孙子兵法》研究论著要目	刘 庆	(399)

#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 “全胜”论新探

高 锐

《孙子兵法·谋攻篇》开首即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样一个“全胜”的战略思想，并从而得出结论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继而又申论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与此相联系，他在《形篇》中讲了善守善攻后，又提出了“自保而全胜”的作战要求。

孙子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这个战争指导思想，并将其列为善战的最高标准，应当说是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独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今著文予以深入的探讨，俾能引起今日研究《孙子兵法》者进一步之注意，从而开掘出有益于丰富现代军事思想的新内容。

孙子的“全胜”思想，就是用不流血的斗争方法，迫使敌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以不损己方兵力财力不破坏对方的兵力物力和将被屈者的兵力财力转化为己力的方式，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做到这样，就会使“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而“用兵之利”则“可全”。

指导战争如果能这样取胜，比起流血战斗取胜来，即使是那些百战百胜者，也要高出一筹。因而这是用兵取胜的最上策。

孙子的“全胜”思想中，是将“全胜”的内容区分成五个层次的。即“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而且是将“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作为“五全”之“次”的。把这段话联系起来看，可以理解为，是“破”中有“全”。即在敌“国”不能“全”屈而不得不采“次”策“破”之时，则应在“破国”中求得“全军”；“全军”不可得而必“破军”时，则应在“破军”中求得“全旅”；“全旅”不可得而必“破旅”时，则应在“破旅”中求得“全卒”；“全卒”不可得而必“破卒”时，则应在“破卒”中“全伍”。这样，虽不能求得全部的不战而屈之，也可求得局部的不战而屈之。用现代话说，就是把“全胜”区分为：战争(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使一个国家不战而屈固然是“善之善者”的最上策，使一伍之众不战而屈也是上策。因此，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既是战略决策的最佳选择，也是战术决策的最佳选择。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从古代战争历史的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军事思想。它把战争从野蛮残暴的屠杀和毁灭的斗争行为，引向力求保全敌方的人力物力为己所用的比较文明的斗争行为。战争所特有的交战、战斗及其破坏性虽不可能因此思想而得以消失，但若所有战争指导者都能奉行这一思想，即使必须交战以决胜负，那也将会大大减少战争中的滥杀和破坏现象。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在战争问题上的反映。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也是一项缩短战争过程的速胜战略。这是与孙子在《作战篇》论述的基本思想一致的。当一个国家不经交战即被屈服，战争当然不会持久。在破国之中能争取对方军队全部或部分不战而屈，也会使战争过程大为缩短，达成速胜。故“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是避免“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达到“兵贵胜，不贵久”的最好的战略。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还是获得良好的战争后果的战略。这是因为一方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采取使对方最低限度可以接受的比较宽大的政策，避免置对方于死地。这就有利于缓和敌对和反抗；胜利者的成果比较易于巩固。而不经或少经交战之破坏，则有利于战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更是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而突出政治斗争的战争指导思想，“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是把属于政治斗争范畴的“谋”和“交”摆到战争手段的首位，而把军事斗争手段的“伐兵”摆在次位，把“攻城”作为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这是一种高水平的战争指导思想。它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它与那种“恃众好勇”，迷信武力，单纯靠攻战去破敌取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不啻有霄壤之别。

孙子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的提出，有适应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的客观需要的一面。从历史文献对春秋时代诸侯国兼并情况的简略记载看，春秋初期约140余诸侯国，在进入春秋后约80年至180年（共百年）间，为齐、楚、晋、秦几个强国兼并和臣服的，在百国以

上。这众多的小诸侯国被兼并和屈服的情况，已多不可考。但从《左传》等书的记载看，其中许多是被不战而屈的。如公元前618年楚穆王率军伐郑、伐陈两小国，都是在楚军兵临国境后不战而屈服的。这种情况似乎说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只有国大力强对国小力弱者，才有条件运用。但若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小国对抗大国、弱国对抗强国，在一定条件下，也是能够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运用“谋”、“交”策略，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自保”目的的。如公元前五世纪初，鲁国在受到齐国攻伐威胁时，子贡（孔子弟子）利用齐、吴、越、晋之间的矛盾及伐鲁存鲁之利害关系，说吴（夫差）伐齐、晋与争强，达到了“存鲁、乱齐、破吴、霸越”之目的。<sup>①</sup>虽然弱小国家要运用“谋”、“交”是不易的，且不免要付出一定的政治、经济（土地）代价，但与强国在兵力悬殊条件下决战败亡相较，应当说还是有利的。公元前306年秦相樗里子将伐蒲，蒲以胡衍说之以利害，得退秦兵。蒲酬胡以金三百斤，便是一例。尤其在两个强国争霸的中间地带的小国，如春秋中期楚、晋争夺中原时之郑国等，利用两强之矛盾及其争夺的胜负得失，采取灵活的谋略，实行“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的方针，求得自保，这种情况也应属于孙子“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范畴。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没有涉及战争性质（正义与非正义）对这一“善之善者”的用兵之法的影响。由于正义与非正义，特别是革命与反革命战争具有不易妥协的性质，在未经战场较量到一定程度时，一般是不

---

<sup>①</sup>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会出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局势的。尤其是当受压迫、被侵略的一方，用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抗侵略和压迫者时，除非压迫者已极端腐朽，起义者能以政治瓦解与突然打击相配合，迫使其部分军队不战而屈外，一般是不具有用“谋”与“交”取胜之条件的。只能在压迫者、侵略者军队被击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之实行不战而屈的“全旅”、“全卒”之策。在此种条件下，正义的革命的一方，设法“破敌”，就由“次”变为“上”了。在“破”敌之中，能“百战百胜”，不能说不是“善之善者也”。因此，对孙子“全胜”思想，不能无条件的不加分析的滥用。

孙子的“全胜”思想，在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虽也在断续地被运用着，但屈人者一方，往往不能坚持贯彻对被屈者的正确政策，致使被屈者或屈而不堪其辱，或屈而不堪其苦，或屈而全遭消灭或稍出怨言而遭杀戮，或忿起反抗而遭残酷镇压。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国、全军的全胜思想，也就在人们心目中不被视为“善之善者也”。加以有些被屈者不是出于爱国爱民和保持民族独立的动机，仅仅是为了保持一己之私利，在有条件抵抗侵略者时，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甘心投降卖国以求荣。这对侵略者来说，是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对被侵略的国家民族的人民来说，却是蒙受了亡国灭族的奇耻大辱与惨遭宰割的深重苦难。这样的“不战而屈”，不仅不被认为是“善之善者”，而且是被作为耻辱和罪恶加以谴责和唾弃的。屈人者也因此而甚为鄙视这类被屈者的形象。又由于从战国时代以来，在法家学派的倡导和推动下，封建帝王实行军功刑赏制度，鼓励军人杀敌立功，杀敌越多，奖赏越重，直至因战功而“封侯”。于是为将者，思

以破敌杀将、百战百胜而封官晋爵，名扬天下，不惜以“万骨枯”而使“一将成名”；为帝者，常以赫赫武功、威加海内为荣耀；为士者，常以勇敌万夫、手刃千仇为崇尚。于是，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战争中英勇战斗、杀敌众多者，才是英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中之战胜者，受到称赞和歌颂。那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者，却相形见绌，成为“无智名、无勇功”之人。更有甚者，战争被那些野心勃勃的帝王贵族，好战乐杀的军阀和野蛮残忍的强人，当成争权夺位、杀人越货、掠地扩土、称王称霸乃至发泄私忿、施加淫威而随意使用的手段，他们根本不懂得或不欣赏那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这也使这一战争指导思想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进步，军事与政治职能的划分，以“伐谋”、“伐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也从军事斗争中分离出去。因而，人们在军事思想中自然而然就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原则逐渐从兵法中分出去了。

近代战争史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得胜者，都是对小国、弱国进行侵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国。这样的不战而屈于人之兵的战略，遭到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的谴责，也遭到一切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反对，当然也不会被看作是“善之善者”的用兵之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本土被不战而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后期，蒋军某些集团（北平、绥远、四川、新疆等处）被不战而屈，才使这种“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的战略思想，得以在正义的革命的战争一方实现出来。它对战争之利和害的大小，也在实际中显现出来。由于战胜者采取并贯彻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其后果比

较有利于和平和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对立斗争的世界局面。与此同时，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火箭、飞机、舰艇等）迅速发展和完善起来，构成了对人类社会生存的严重威胁；非核的现代化常规兵器和高技术兵器也相继问世。现代化战争的消耗、破坏之巨大和迅速，已非历史上任何战争可与之比拟。现代化战争为害之严重，已从某些局部战争中为人们所认识。现代兵器之用于战争，真正可以做到孙子所说的“毁人之国而非久也”。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军事状况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战后四十年来，虽然非完全现代化的局部战争不断发生，但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却始终受到了抑制。核战争更未成为现实。然而，以核武器相威慑，却成了两强争霸和互相遏制的斗争手段。美国还首先发明了“核威慑战略”，作为其推行争霸政策的军事手段。适应这种威慑战略的需要，英、美的军事理论家，从中国的二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中，找到了理论根据，这就是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的思想，终于登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军事理论和战略决策的“庙堂”。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抗衡两强争夺的压力，为了争取和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也不能不积极地寻求非战的斗争策略，力求“自保而全胜”。因此，“伐谋”、“伐交”，便成为当今国际斗争中处于首位的斗争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保卫国家安全，反对外来侵略，反对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方面，是采取防御战略的。它是不怕战争威胁的，但又决不主动挑起战争，而且是尽力避免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即使被迫进行有限的

自卫还击战，其宗旨也是为和平的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创造条件，决不随意扩大战争。它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的胜利，为自己的发展建设争取到了一个持续的国际和平环境。现在更加注重维护和发展国际和平，以利于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这是对孙子慎战、全胜思想的实际继承和发扬。

在当今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正确宣传和发展孙子的慎战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国”、“全军”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思想，“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的思想，使之普及于世界各国，对于解决国际矛盾斗争，抑制那些喜欢穷兵黩武、玩弄战争、妄想以战屈人的战争狂人们的活动范围，遏制那些不必要的战争，不无积极的意义。

吾以此而申论孙子的“全胜”思想，并就教于海内外的方家。

# 论《孙子》的战略指导思想

吴如嵩

今天，世界由对抗转向对话，紧张转向缓和，处于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样的新时期，研究《孙子》、研究军事，是不是不合时宜了呢？是不是失去了“古为今用”的价值而缺乏现实意义了呢？回答是否定的。这只要从《孙子》产生的历史契机入手，深入分析其战略指导思想，正确的答案就会显现在我们面前。

研究《孙子》问世的历史契机有着特殊的意义。《孙子》成书于春秋末年，公元前512年孙武以十三篇兵法见吴王，《孙子兵法》从此问世。那么，《孙子》的撰写时间应当在此之前，它所总结的战争经验及其所反映的时代也应当在此之前。从春秋时代总的历史趋势看，认为《孙子》是诸侯争霸、列国兼并形势下的产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孙子》问世的历史契机看，它又是当时和平与发展的转折时期的产物。这一点，在过去倡导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政治气候下，鲜有学者提及。只要我们不存偏见，就应当承认《孙子》对当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与和平——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我们知道，在孙武见吴王、呈兵法之前，宋国大夫向戌就曾于公元前546年发动了一场弭兵运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和平运动。这是一场影响各国战略转变的弭兵运